

当代中国科幻中的科技、性别和“赛博格”

——以《荒潮》为例

刘 希

内容提要 “科幻现实主义”的倡导者陈楸帆将《荒潮》作为一个重要的文体实验，在科学幻想中注入对全球化背景下诸多问题的现实批判，也通过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赛博格”表达了对科技、人性、“后人类”等问题的思考。它借一个第三世界底层女性形象高扬了人文主义精神，但是这一形象在具体的文本再现中又有着被符号化和本质主义化的危险。本文分析这部“科幻现实主义”力作的得失，并在“赛博女性主义”的启发下，探讨当代中国科幻如何创造出具有真正革命性的身份认同、社会关系以及思维方式的作品。

关键词 《荒潮》；科幻现实主义；赛博格

在《三体》之后，新生代作家、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陈楸帆的《荒潮》是当代中国科幻界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这部被科幻界翘楚刘慈欣称为“近未来科幻的巅峰之作”^[1]的作品在2013年10月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并在问世以来受到了中外科幻研究界、“后人类”思潮研究者的极大关注^[2]。《荒潮》由《三体》著名译者、科幻作家刘宇昆（Ken Liu）翻译成英文，在2019年4月由北美最大的幻想文学出版社TOR出版，并已卖出英国电影版权。作为“科幻现实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陈楸帆将这部小说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实验，在科学幻想中注入对全球化背景下诸多国际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也通过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赛博格”（Cyborg）形象“小米”表达了对科技、人性、“后人类”等问题的思考。

对科技、性别、社会与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呈现是《荒潮》的最大贡献。“小米”作为一个基于女性身体的“赛博格”是当代中国科幻中非常重要的“后人类”主体形象。这个与科技结合的新型身体能否逃离阶层、地域、性别等权力机制的宰制呢？被精彩刻画的“人机融合”与“赛博女性主义”（cyber-feminist）所期待的可以打破自然/人工、有机体/机器、身体/心灵、男/女等二元对立的

“赛博格”是什么关系？性别又在新的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后人类”主体的想像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同时，小说中尖锐的性别现实批判与正面描绘的女性形象是否挑战了传统中国科幻的理性中心和男性中心，实现对科学、科技等议题的多元思考？在小说的具体文本上，女性形象有没有摆脱被符号化、他者化的命运而展示出积极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目前对《荒潮》的研究并没有充分讨论这些问题，而本文将通过分析试着给出解答。

—

经过几十年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也伴随着相应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出现，这些问题在当代科幻作家如王晋康、韩松、陈楸帆、郝景芳等人的作品中再现并加以批判。作为当代中国科幻直指社会现实的力作，王晋康和韩松的作品书写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人力成本问题，郝景芳对新技术服务于社会分割和阶层固化题材情有独钟，陈楸帆的小说则关注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人的异化问题。

完成于2012年的《荒潮》是一部关于“近未来”的科幻小说，背景设在科技和信息高速发展的

2025年，但是每个故事情节都直指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灾难、资本侵入、社会割裂、阶层分化和性别压迫，等等。小说中“硅屿”的原型是陈楸帆故乡广东汕头附近的“贵屿”。这个小镇在90年代后发展出回收处理全世界电子垃圾的大小企业和家庭作坊，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场之一，但同时也成为广东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以电子垃圾回收产业为切入点，小说描写了本地宗族企业对外来打工群体的压迫，“硅屿人”与“垃圾人”（打工者）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也揭示了跨国的科技和环保企业以第三世界国家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治理污染为名，进行资本输出赚取更大利益，同时攫取稀有资源。男主人公、跨国企业惠睿公司雇用的华裔翻译陈开宗原本对公司有着“消除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拯救他们（注：岛民）于水深火热”^[3]式的迷思，但随着故事进展，陈开宗发现这个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工业园不仅为了盈利，还从消费类电子垃圾中回收稀土元素作为军事用途。“他们为人民带来工业园、发电站、清洁水源及机场，骗取他们的信任，继而成群结队走入厂房，在恶劣环境中如奴隶般长时间机械劳作，换取比他们父辈更为微薄的薪酬。”^[4]跨国大企业的到来对本地垃圾回收宗族企业形成巨大冲击，故事就在这两股势力与“垃圾人”的层层对抗关系中展开。《荒潮》深刻揭示出中外企业对原材料和人力资源的争夺是跨国资本主义和本地新式宗族资本主义利益冲突的根源。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垃圾回收产业所支撑的硅屿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写照。有研究者在梳理西方科幻小说传统时提出：“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之后，对于工业化、技术化的城市的负面印象一直是科幻小说当中的重要母题。大工业生产模式下，城市中的两极分化，城市自身的无限制扩张，以及对传统历史乃至人性本身的消解成为当时作者所集中书写的问题。”^[5]当代中国科幻作家特别是韩松、陈楸帆和郝景芳都在作品中涉及了城市化带来的分裂和冲突。《荒潮》中“硅屿人”与“垃圾人”之间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大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与打工者社会分

化的缩影。无论是宗族、本地资本的壮大还是外来的跨国资本的争夺都是以对廉价的外来打工者的剥削为基础的，并且在经济剥削之外形成文化上的压迫。对此，小说中有着精彩的描写：“城市功能分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在这些国家里似乎演变成一种痼疾：被分化的不仅仅是功能，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族、宗教、社会地位，甚至尊严。城市人自觉地被划分为市民与流民，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待遇，彼此排斥、仇视、畏惧，地理版图被认为添加上一个虚拟的意识形态图层。”^[6]

《荒潮》还涉及城市化、科技化背景之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作者看到了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现代化进程中受到的冲击，但也注意到有些传统和民间信仰并没有完全崩解消失，而是被强化以抵消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某些巨大冲击和负面影响。如以保护同族的名义聚拢在一起的传统宗族，传统的节日如盂兰盆节的保留等都有抵御现代化过程中的“脱位”或者安抚心灵的作用。在《神经漫游者》的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之后，很多西方“赛博朋克”（cyber-punk）的科幻作家都会涉及全球化这个主题。而《荒潮》描绘的是现代性和全球化浪潮中各种“意识形态图层”，即各种压迫性的势力和话语：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宗族势力的揭示，也有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有对现代性的批评，也有对延续的地方传统文化的审视；既有对原教旨主义的质疑，也有对新科技的迷思的问询。小说像数把双刃剑，同时戳向压迫性的新宗族、新殖民者，地方保守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新科技和封建迷信思想。

有趣的是，《荒潮》里这些批判的视角恰恰是通过“近未来”世界的想象和虚构达成的。刘慈欣曾经在一篇访谈里说：“科幻小说在本质上是超现实的，与童话和奇幻不同的是，它不是超自然的。它是一种可能性的文学，把未来不同的可能性排列出来，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能成为现实。科幻的意义正是在于这种基于科学更改的超现实。”^[7]《荒潮》的作者陈楸帆既不从“超现实主义”，也不从“后现代主义”的科幻文类“赛博朋克”的角度探讨自己的作品，他所关注的是在魔幻或幻想风格背后的

“现实主义”或现实相关性。2012年，在“星云奖”的科幻高峰论坛上，陈楸帆第一次提出“科幻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科幻在当下，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用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8]并且对“真实性”如此解读：

我在讨论的是“真实性”。“真实性”不等于“真实”，它是一种逻辑自洽与思维缜密的产物，这或许是“科幻现实主义”不同于“现实主义”，并将后者往前推进的那一步。而迈出这一步，则海阔天空，整个宇宙和历史都将成为我们的游戏机和试验场。我们设置规则，这些规则基于我们对现有世界运行规律的认知和理解，然后引入一些变量，它们有些会很极端，引发链式反应，变化从个体开始，蔓延到群体、社会、技术和文化，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产生改变，但这一切都是可理解、可推敲的，却是符合逻辑的，我们的故事便会在这样的具有“真实性”的舞台上演。^[9]

陈楸帆承认其“科幻现实主义”并非真正的作为传统文体的“现实主义”，但是它通过推理或者幻想引发的离开客观现实的实验又无疑有着一定的现实指向性，比起外在的事实，它通往的是从现实世界的秩序和逻辑延伸出去的“真实性”。陈楸帆对这种“符合逻辑”的“真实性”的解读与著名科幻学者D. 苏恩文（Darko Suvin）对于现代科幻小说是“认知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论断相近。苏恩文认为科幻小说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是陌生和认知的相互作用，其主要形式就是给作者的经验世界提供一个替代性的想像框架”^[10]。他对“认知”的理解是它“不仅仅是现实的反映，还是对现实的反思”（not imply only a reflecting of but also on reality），它“不是对作者所处环境的静态反射，而是通过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试图对环境有一个动态的改造”^[11]，所以在苏恩文看来，20世纪的科幻小说“已经进入了人类学和宇宙学的思考，变成了一种诊断，一种警告，一种对理解和行动的召唤，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可能的替代性方案的描画”^[12]。可以看出，苏恩文强调的是陌生化了的“认知”对现实环境的思考、警示和对其他可能性

的想像。同样，杨庆祥在《作为历史、现实和方法的科幻文学》一文中曾谈到科幻文学本身有着“越界性”，其中就包括它会提出“或然性的制度设计和社会规划”，它“不仅仅是问题式的揭露或者批判（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优势），而是可以提供解决的方案”^[13]。这就是“科幻现实主义”有鲜明的思想实验性又有现实批判性之处。

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提出“科幻现实主义”的概念，其背后也是一种相似的通过科学幻想进行现实再现和批判的观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五四”时期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都是先后流行过的文艺思潮。“科幻现实主义”与这一谱系形成对照和对话，并贡献出新的思维方式和文本策略。尽管再现现实的方式非常不同，“科幻现实主义”却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一样回应现实语境，探讨与批判社会问题。在《荒潮》或严密推理或大胆想像的情节背后，其追求的“真实性”就是再现全球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背后种种压抑性的现实秩序和思维方式，并做出挑战和反思。这也是其他中国科幻作家如王晋康、韩松、刘慈欣等的共同追求。

二

在对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反思之外，《荒潮》最出彩的部分当属对未来的信息技术社会乃至科技本身的描绘。2025年的硅屿仍然是一个阶级分化和对抗的社会，在这个等级化的技术社会中，科技并没有帮助人们对抗或挑战以族裔、阶层、性别为基础的歧视和不平等，反而是通过新技术的运用放大了这些不平等。在小说中，社会上层可以无限享用高速信息通道和高科技的产品（如功能强大的义体），然而对于底层而言，“违反限速令，这是一项重罪”^[14]。文中有一段超现实主义的对于技术社会的描摹：

舞会邀请码会发送到电子义眼以供虹膜扫描，肠胃未培植强化酶的人群无法在超市购买特定食品饮料，基因中存在的可遗传性缺陷的父母甚至拿不到生育许可证，而富人们可以通

过无休止地更换身体部件来延长寿命，实现对社会财富的世代垄断。^[15]

对高速信息网络、高级生物技术和高科技义体的获取，是以对“少数派”的歧视、排挤和剥夺为基础的。而阶层固化和阶层滑落的危险也令人担忧：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成为多数派，却有可能永远成为少数派，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很可能因为生物技术的进步从政治经济领域渗透到生命政治领域，从身体基因上被固定下来。小说揭示出赛博空间（cyber-space）、生物技术作为科技的成果，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产品，可以折射出现实生活中的种族、阶级、性别等各种身份和社会关系。男主人公陈开宗最后发现，“义体不再是残障者的辅助工具，也不仅仅是身体可自由替换的零部件或装饰品，义体已经成为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它储存着你的喜怒哀乐，你的阶级，你的社会关系，你的记忆”^[16]。能否负担得起义体，会购买具有何种功能的义体，都是与一个人不同的社会地位和需求勾连在一起的。故事中的孩子们渴望拥有高科技的义肢可以帮助自己踢球，甚至情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交换。高级的义肢不仅仅拥有新的功能，还具有象征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文化资本，因此被平民孩子所深深向往。小说中的“垃圾人”只能负担得起过时的二手“增强现实眼镜”，“而增强现实对于他们的意义，也并不像那些信道开放区域的现代人，花上几百块钱月费，可以查看任何规定权限范围内的信息，天气、交通、即时搜索、购物比价、虚拟游戏、浸入式电影、社交通讯……”^[17]，即使花钱买了二手的“增强现实眼镜”，“垃圾人”也并不能适应相应的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购买数字毒品“数码蘑菇”是为了逃避现实，暂时忘记自己悲惨的打工、流动生活的沉重而沉浸于对过去的回忆之中。

《荒潮》对未来的信息技术社会的另一个犀利解剖就是预测它有可能成为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一样娱乐至死的社会。技术成为追求感官刺激的方式，成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土，表面的愉悦和享受代替了深度的思考。“小米看见更多的孤独者、赌博者、成瘾者、无辜者……他们躲藏在城市明亮或昏暗的角落里，腰缠万贯或不名一文，享受着技

术带来的便利生活，追逐人类前所未有的信息容量与感官刺激。他们不快乐，无论原因，似乎这一功能已经退化，如同阑尾般被彻底割除，可对快乐的渴望却像智齿般顽固生长。”^[18]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信息技术社会中，科技是否能作为工具帮助底层劳工实现反抗和团结？小说也探讨了这一问题。硅谷的底层人的确通过科技紧密连接在一起，“数百个垃圾人通过增强现实眼镜与小米互联，共享视野”^[19]。小米“赛博格”因此引领并且操控着底层劳工的抗争行动。这种抗争并非建立在“垃圾人”自我意识觉醒或是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而是由于背后有不可控力量的主导，掌控和“编程”。“李文近乎痴迷地看着她，又恼怒地清醒过来，这种虚幻的崇拜感不过是人工植入的小把戏，并借助视觉病毒感染每一个垃圾人”，这些人“像条被重新编程的芯片狗”^[20]。小说由此引申到对“赛博格”本身的讨论和反思。

1985年，D. 哈洛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赛博格”的概念，将其建构为一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神话。她提出：“赛博格”作为一种控制论有机体，是有机体与机器的杂糅。她认为通讯技术与生物科学的发展可以模糊机器与有机体之间差异的界限，人和机器之间可以变成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关系。哈洛维提出这个乌托邦式的概念是为了打破有机体与机器、大脑与身体、自然与人工、物理与非物理的界限等西方传统思维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和本质主义的范畴，探索可以“跨越边界”的革命性的身份认同、社会关系乃至思维方式的重组。她的“赛博格”是打破一切二元论、等级制的控制的“后人类”政治身份，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必须编码的自我，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安排植根于高科技促发的社会关系里的种族、性别和阶级^[21]。

在此视角的启发下，我们可以考察《荒潮》中“赛博格”与种种边界的关系，探讨其在“近未来”高科技社会里主体性为何。小说的女主角小米是潮汕宗族与跨国资本主义冲突之中一个被压迫的底层人物，在遭受了非人的凌辱和未知病毒的感染后，她变成了一个“赛博格”，她的人格中分裂出另一

个具备强大的机械力量，冷漠而邪恶的“小米1”。

“我是偶然。我是必然。我是一个新的错误。我既是主宰又是奴隶，是猎人又是猎物。”

另一个小米爆发出尖笑声，比冰更冷，“我是幼态持续的人类文明对飞跃式进化的呼唤。我是现代科技在自组织洪流中卷起的非随机旋涡。”^[22]

“小米1”显然并没有与有机体“小米0”完全融为一体，在两次精彩的合作以反抗强权压迫以外，主要是一种对立、互相不认同乃至竞争的关系。它在表面上是一个流动的、不固定的形态，实际却是一个技术中心主义的掌控者。“小米1”似乎有读心术，可以以人力不可及的方式帮助“小米0”实现她的一些愿望，但是更多时候是在操控着“小米0”，反对“小米0”的“人类软弱”，将超能力置于道德之上。“小米0”则“不想变成怪物”，不想杀人，不想被当成实验品^[23]。

《荒潮》里的“赛博格”被塑造成一个收编、剥夺、压制人的自主意识的形象，在这过程中它不是利用理性、逻辑，反而诉诸“信仰”“宗教心理”来将自身神话化，使人抛弃理性。如同《太空堡垒》中并没有个体化思维，而是被外在植入了群体思维的赛隆人。“究竟是什么左右着人们的行动，是所谓的自由意志，还是来自群体的感官冲动？”^[24]科学发展和技术力量并不一定都会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小米“赛博格”的确得以进化成为一个有着巨大的反抗性和召唤力的控制论有机体，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却面临着被剥夺自主意识的危险：

万一她是个全新的造物呢？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人类，人类探究世间万物的秘密，发明理论，创造科技。人类寄望于造出更接近自己的造物，让科技模仿生命，不断进化，力图接近金字塔的顶点，而人类却轻易地将自己全盘托付给科技，退缩为坐享其成的寄生物，停滞前进的步伐。^[25]

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赛博空间所带来的“后人类”的想像，对科技文明的反思和对技术异化的警惕一直都是新世纪中国科幻的焦点。陈楸帆曾经在一段访谈中谈及“科技”可能带来的异化以及科技与人性的复杂关系：

科学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巨大“乌托邦”幻想中的一个，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完全走向反对科学的一面，科学乌托邦复杂的一点是它本身伪装成绝对理性、中立客观的中性物，但事实上却并没有这样的存在，科幻就是在科学从“魅化”走向“去魅”过程中的副产物，借助文字媒介，科幻最大的作用就是“提出问题”。^[26]

对小米“赛博格”的塑造正是作者“提出问题”的方式，“赛博格”有着何种主体性？技术与道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理性和非理性在后现代、“后人类”的技术奇观中应该被置于什么位置？《荒潮》中的“赛博格”绝不是哈洛维所想像和召唤的革命性的“后人类”主体，而是一个技术中心、利益中心的象征，被塑造为人文主义的对立面。这个当代中国科幻中重要的控制论有机体形象被想象为有权力欲的、熟稔人性又可以利用人性以达到自身目标的、不择手段的唯目的论者，它可以收编各种被阶级、种族、性别不平等所压迫的人群，却无意真正对抗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或父权制。小米“赛博格”最终被认清其真面目的正义的人类合力杀死，足以颠覆世界、改变人类的力量并没有出现。在警惕科技可能导致的人的异化、重新肯定人文主义上，这个“伪”“赛博格”作为一个重要的修辞和能指发挥了重要的文本功能。

三

哈洛维的“赛博格”概念作为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杂糅体，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和人类的“政治性的本体论”。它是一个刻意打破西方传统思维中各种二元对立模式包括性别二元论的乌托邦概念，是后现代社会中一个去本质化、去整体论、反对任何他者化的流动的新身份，因此它被作为基础以建立一个生态负责的、反种族主义的、去阶级的、女性主义的和性别平等的社会。从性别视角去审视小说中“赛博格”的意义和文本功能非常必要。《荒潮》中的小米“赛博格”是基于一个女性身体的控制论有机体，而女主角小米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重要的正面女性形象，突破了以男性正

面形象为中心的主流写作模式。但这部小说有没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性别逻辑，一种超克男性中心主义的主流性别观的另类想象呢？

首先，小说以强烈的对性别压迫的批判，揭示出新的科技、赛博空间可能继续是男性中心的。有些赛博女性主义者认为网络科技可以成为一个反抗压迫女性的政权制度的有效工具，她们希望“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今社会男性与女性的身体已经无法同技术相分离，因此同社会性别相关的权力差异将减弱，与技术相结合的新型身体将听命于新一套的规则而与父权制社会的男性宰制无关”^[27]。然而赛博空间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产品，会折射出现实生活中的种族、阶级、性别等各种身份和社会关系，也是性别化了。“实际上电子媒介并没有使社会性别中性化，反而更加强化了社会性别，因为网络使用者在试图构建网络身份时往往夸大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因此可以说，并不存在社会性别完全被消除的赛博空间。相反，赛博空间经常复制传统的男性与女性特质。男性霸权主义倾向依然存在，赛博空间仍然相当保守，因为它沿袭了传统父权制话语对女性的建构。”^[28]小说中，流传在硅屿地下论坛的强奸视频是“用增强现实眼镜录制的，带着强烈的第一人称视角风格，摇晃、失焦，却又具有无比真切的代入感”，李文“终于明白自己异乎寻常的愤怒并非来自强奸本身，而是来自呈现强奸的方式。暴徒利用第一人称视角的技术，让每个观看视频的人都成为强奸犯，体验施虐的快感”^[29]。新的电子媒介和信息通道只是用了新的技术手段延续并且加深了对女性的暴力倾向和对女性的物化。这种对女性的暴力和物化通过新的媒体介质被传播给更多人，男性的凝视在传播中并没有被挑战，反而被共享和增强。

“小米1”曾经求助于一个“不归属于任何国家、政党或者跨国企业”的“低轨道服务器站群的数据存储及远程计算服务”，这个名为“安那其之云”的无政府主义赛博空间表面上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它宣称：“我们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笑），纯粹的自由意志信徒，希望我们的服务能够帮助您在短暂的肉体生命中远离强权、反抗控制、拥抱自由、平等与爱。”^[30]但即使宣称

是纯粹自由意志信徒的数据信息平台的背后也有一个收集名人脑模型爱好者，从而使得“安那其之云”愿意接受“小米1”的“海蒂-拉玛的意识模型”的贿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美貌、智商最高的女性，CDMA之母，而且风骚性感，一生艳事不断”^[31]。非常讽刺的是，这个乌托邦式的赛博空间即使可以抵抗权力和商业逻辑的规约，最终无法去除其根深蒂固的男性视角。小米“赛博格”为了掌控“垃圾人”而表演了女性的柔弱特质，从而争取到男性的信任。它成功的原因在于与男权意识形态共谋以迎合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如果说赛博空间和“赛博格”都深深刻写着社会权力关系，那么J·斯科特（Joan W. Scott）所提出的“指征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32]——社会性别，与其相关的权力也依然存留于其中。

有研究者在分析当代西方赛博朋克小说时发现，大多数赛博朋克小说都像一个男孩俱乐部，“主人公几乎总是男性。当女性人物真正出现的时候，她们很难超越女性的传统的固定形象”^[33]。《荒潮》中重要的人物：冲突的宗族老大们、重要的政府官员、跨国公司代表、华裔青年都是男性。整部小说中只有三个女性人物：宣扬封建迷信的骗人的神婆、“垃圾人”中的凶狠的女打手刀兰和女主角小米。前两者的故事情节非常少，而小米这个背井离乡来到硅屿打工的“垃圾人”中的柔弱女孩被塑造成弱者中的弱者、底层中的底层，是潮汕族群内部矛盾和外来资本争夺垃圾回收业故事线索的中心人物。她虽然是弱者，但仍然变为一个反抗者。她在遭受病毒侵袭后成为人机结合的控制论有机体，带领饱受压迫的外来劳工奋起抗击，但又拒绝做失去人性底线和伦理基础的以暴易暴的反抗者。这是当代中国科幻中非常重要的第三世界底层女性形象。小说对她两次反抗的描写非常精彩，这个角色承担了延续人文精神的重要的文本功能。

然而对于这个重要女性形象书写中的性别政治，有学者曾质疑：“《荒潮》最终成为对女性苦难的陈列，并且止于陈列。作者虽然始于对其现实生活经验的反复考察、想象和渲染，但最终却仅仅是在讲述困顿世界当中的悲惨故事，女性的苦难经验因而沦为被观察和审视的对象——这的确是一个

好故事，但文本之外的更多可能性，便也无处寻觅。”^[34]女性的苦难被视作一个对社会问题的再现和反思的便利方式。小米在小说中一直是各种男性人物，包括本地宗族、流氓、西方企业的代表、复仇的“垃圾人”领袖、华裔青年精英等人故事中的对立面：她是本地宗族、流氓、外来资本压迫的受害者，是最后激起“垃圾人”集体反抗的重要导火索，是李文借以怀念妹妹和复仇的契机，是男主人公认识自身在海外弱势处境的一个镜像，还因其柔弱善良而成为邪恶的“小米1”即“赛博格”利用和控制的客体，她是各种男性主体身份构建中的他者。

小米展现出的最强烈的能动性当属被跨国资本主义代表斯科特挟持后，拒绝去做“杀人的怪物”，反而请求陈开宗毁灭自己来毁灭已经无法控制的第二人格，成为人类良心的化身。“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发生在小米的人类良心和可怕的后人类控制体之间的强烈的斗争。小米0和小米1的分裂人格或许指向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突变带来的后人类处境的精神分裂。她快速发展出的超人类能力和向人类报仇的渴望表征着一种悖论：即后人类的对技术强大的信仰和对技术的实际限制的深刻质疑的结合。”^[35]小米的行动力主要在于反抗“小米1”的完全掌控，在小米完成最重要的行动——请求别人毁灭自己之后被电磁枪击中，脑中的定时炸弹被拆除，但“她的逻辑思维、情感处理及记忆能力退化已不可逆转，仅能终生维持在三岁小孩的水平”^[36]。除了担任各种男性角色，以及邪恶的“小米1”的客体、他者和镜像，小米这个女性形象本身的自我成长不够明晰。她在小说中始终承袭着柔弱的女性刻板印象，成为善良、道德等人性意义上的承担者，是对“恶”的“后人类”的质询中关键的文本修辞。但这个人物更多地被符号化，人物形象本身相对扁平 and 简单。可以说，这种对于“后人类”情境的想像最终让作者回归且确认了传统的人文主义立场：新的控制论有机体很可能是技术中心的、非道德的，而不愿被它操控的人类仍是理性的、反抗的、反对技术神话的、有良心和道德的。有学者在研究现代性和科幻文学的关系时发现，科幻作者“也会将视线聚焦于沦为机器附庸的人类个体，

甚至从这种并非赛博格（Cyborg）的‘机械/生命综合体’当中，窥见人类主体性的消解和人类‘本质’的弥散——在许多时候，这种从人走向非人的过程，往往居于科幻审美的核心”^[37]。显然，《荒潮》中对小米“赛博格”的想像也贯穿了这种基于传统的人文主义的对人类主体性的确认和维护。

但是当我们深究这种人文主义立场的展开，发现其文本书写仍基于一种二元的、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不是小米，而是宗族老大和陈开宗在小米帮助下完成了反思或者成长，小米在“完成任务”后就变成了3岁小孩，供男主角陈开宗永远地怀念。这种人文主义的想像借助了本质化的性别转义才在叙述中完成：小米本身是柔弱的、被动的、善良的、道德的和不变的。周蕾曾经在《社会性别与表现》一文中提示我们：

如果按照当代文化政治再三强调的那样，表现与社会性别、种族、阶级和其他涉及等级地位及从属关系的差异问题是不可分开而论的，那么斯皮瓦的文章则说明，我们也必须关注问题的逆命题：即使而且特别是对社会最下层人的关注，如“第三世界”的女性弱势群体，也不能回避表现中的物质实体——那些负责传达意义且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法律和经济的实证主义替代物——的结构与比喻等修辞手法。^[38]

她警示我们，即使是再现第三世界底层女性的经验，也要注意文本修辞手法中所隐藏的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性的范畴。《荒潮》中的人文主义想像正是基于一种本质化的性别差异话语。可以说，小说对性别压迫的揭示与正面书写的女性形象挑战了传统科幻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但女主人公最终没能摆脱被本质主义化的文本修辞命运，对其主体性的想像因基于传统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而是有限的，无法创造关于“性别”身份的新的可能性。

正如性别是想像“现代性”的一个关键修辞一样，它也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刻画人性和“后人类”的一个重要的修辞手法。除了《荒潮》中的小米“赛博格”，刘慈欣的科幻短篇《微纪元》（2010）和韩松的科幻小说《地铁》（2011）中的《符号》也贡献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后人类”女性形象。《微

纪元》中地球上的微人“最高执政官”是一个孩子气、快乐、无忧无虑的女性，在这个关于“后人类”的乌托邦故事中，女性被作为单纯的、没有历史意识和危机感的一个文本符号；在《地铁·符号》的“后人类”地下世界里，男主人公遇到一个恐怖恶心的女性“再生变异体”，因为这个女性已经无法帮男主角重建其男性主体认同，最终被他杀死。可见性别修辞是中国科幻想像和批判“后人类”世界的重要文本能指和动力。可以说，《荒潮》也是如此，性别问题推动了小说对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后人类”种种问题的批评和反思，但可惜小说仍有隐蔽的偏颇视角。《荒潮》里的女性控制论有机体并没能成为哈洛维所想像的，可以超越不平等性别秩序的、去本质化的全新物种“赛博格”，而是成为全球化时代可能带来的压迫性的新秩序的象征，成为科技爆炸的新时代里破除科技迷思，肯定理性、道德的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结 语

在一个访谈中，陈楸帆曾谈及科幻在当下的意义：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本雅明笔下背向未来，被进步之风吹着退行前进的天使，我们愿意看着过去，因为那是我们所熟悉，感觉安全舒适的世界。我们需要厘清什么是人？人类的边界在哪里？人性究竟是所有人身上特性的合集还是交集？究竟一个人身上器官被替换到什么比例，他会变成另一个人或者说，非人？这种种的问题都考验着我们社会在科技浪潮冲刷下的伦理道德底线，而科幻便是最佳的引起广泛思考的工具。^[39]

可以说，《荒潮》即是一个提出问题、并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作品。它以“科幻现实主义”的批判视角，描画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全球化浪潮中各种压迫性的势力和话语：中国传统宗族势力和地方保守主义，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它呈现了一个被资本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父权制所裹挟的想象世界，表达了去魅的、反思的科技观，揭示出新的科技空间与现实生活中种族、阶级、性别等各种

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密切联系；它以一个第三世界底层女性的形象指征全球化时代的各种不平等的关系：国家、城乡、阶级、性别、科技，等等，并用这一形象来完成对技术过度发展的反思，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是当代中国科幻中“科幻现实主义”取得的实绩，是科幻这一特殊文类对于全球化时代的现实批判做出的独特贡献。

但是，《荒潮》中这个重要的第三世界底层女性的形象基于传统的人文主义话语，在具体文本书写中则被他者化和本质化了。这种性别书写和修辞并非特例，恰恰是很多当代科幻小说特别是男性作家作品共有的特点。在哈洛维所期待的不仅仅是性别意义上的，更是阶级和族群意义上的多重主体性上，尚未有当代中国科幻作品贡献出有力的探索，以真正符合苏恩文所期待的那种以“创造性的方式试图对环境有一个动态的改造”^[40]和杨庆祥所提出的“或然性的制度设计和社会规划”^[41]，从而对全球资本主义下种种压抑性的现实秩序和思维方式做出更有力的挑战。

赛博女性主义艺术家F·威尔丁（Faith Wilding）曾说过：“如果女性主义具备探索赛博空间的潜能，它就必须紧密跟随变化中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状况，因为通讯技术和技术科学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正产生巨大的影响。使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洞见和策略工具与网络空间中存在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相斗争，这正是赛博女性主义者的任务。”^[42]在这部小说中，科技并没有变成实现解放的工具，反而成为可能实施压迫的工具。小米“赛博格”成为对资本主义、男性中心主义传统的承袭、逻辑的复制，并没有带来新的、政治性的、打破边界和规定性属性的可能性，未能呈现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荒潮》可以说是关于人类在被科技变异后能否达到解放的一个失败的故事，警示我们在未来构架中设想新的科技与人的关系。性别仍然是小说的重要修辞方式，但是《荒潮》未能贡献出一个去本质化、去整体论、反对一切他者化的、流动性的身份，包括性别身份。陈楸帆本人也承认，“中国当代科幻对于性与性别议题的书写与探索依然稀缺，或是停留在表层的符号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到文化基底

之中，这与整个社会性别意识的觉醒程度亦是密不可分”^[43]，他非常愿意在这方面做出自觉的探索。

因此，笔者期待在未来中国的科幻创作中，有从赛博女性主义视角对“赛博格”的想像和形塑，在“后人类”问题的探讨中克服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书写模式，贡献出一种试验“跨越边界”的革命性的身份认同、社会关系以及思维方式的科幻文学。

[1][3][4][6][14][15][16][17][18][19][20][22][23][24][25][29][30][31][36] 陈楸帆：《荒潮》，封底，第42页，第125—126页，第30页，第199页，第191页，第186页，第62页，第212页，第209页，第199页，第235页，第246页，第229页，第240页，第165页，第216页，第217页，第25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2][26][39] 何平、陈楸帆：《访谈：“它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文学”》，《花城》2017年第6期。

[5] 姜振宇：《赛博朋克与数字时代的生活经验》，《山东文学》2016年第9期。

[7] 刘慈欣：《我愿意成为“后人类”》，《离线Offline》，转引自 <http://cul.qq.com/a/20160201/037328.htm>，2018年8月1日。

[8][9] 陈楸帆：《对“科幻现实主义”的再思考》，《名作欣赏》2013年第28期。

[10][11][12][40] Suvin, Darko. “On the poetics of the science fiction genre”. *College English* 34.3 (1972), pp. 372–382, p.375,377,378,377, 中文乃笔者自译。

[13][41] 杨庆祥：《作为历史、现实和方法的科幻文学》，陈楸帆：《后人类时代》，第7页，第7页，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21] Haraway, Donna.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49–181.

[27][28][42] 都岚岚：《赛博女性主义述评》，《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5期。

[32] Scott, Joan W.,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 (1986): pp. 1053–1075, pp. 1072–1073.

[33] 卡伦·凯德拉：《女性主义赛博朋克》，王逢振编：《外国科幻论文精选》，第21页，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34] 姜振宇：《停滞的女性意识——评科幻文学中的性别问题》，《文学报》2016年7月14日，第19版。

[35] Song Mingwei,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visible”, in Carlos Rojas and Andrea Bachn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546–559, p. 560, 中文乃笔者自译。

[37] 姜振宇：《现代性与科幻小说的两个传统》，《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

[38] 周蕾：《社会性别与表现》，马元曦、康宏锦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第3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3] 陈楸帆：《科幻中的女性主义书写》，《光明日报》2018年09月26日，第14版。

[作者单位：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
责任编辑：费冬梅